

“櫻榴居”中写传奇

■殷慧芬

鲁彦周老师逝世十周年的时候，我收到他夫人张嘉老师寄来的《鲁彦周评传》（唐先田、温跃渊著，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6 年 6 月版）。十年了，还有人为鲁彦周著书立传，足见他与他作品之不朽。抚摩这本装帧精美的评传，阅览书中图文，我又见鲁彦周老师的清癯面容，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。

2002 年仲夏，我应邀赴内蒙采风，同行的有鲁彦周老师和夫人张嘉老师、文学评论家吴泰昌、杂文作家李下等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鲁彦周老师。鲁老师的大名我早已如雷贯耳，许多年前，他的一部《天云山传奇》让我感动得热泪滚滚。

那天鲁彦周老师模仿上海口音指着我说，“噢，上海人，好！”这也许是鲁老师爱屋及乌，因为此时他的儿子鲁书潮和儿媳王丽萍已经在上海立足，并且有了一方不错的天地。张嘉老师更是一副慈母心肠，拉着我打听上海的气候，凉了还是热了，让我顿感无拘无束。

其实无论从年龄、资历、文学成就来说，我都是鲁彦周老师的晚辈，理应对他毕恭毕敬。可不知为什么，面对白发儒雅的鲁老师，我感到更多的是一份亲情。鲁老师的面容与我已经仙逝的父亲非常相似，都有点清瘦，有点江南男人的谨言慎语，他脸上那份慈祥的笑意比任何语言都富有感染力。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，正是这一特殊而传统的情愫，让我们一见如故。

我们五人后来在内蒙同志的陪同下去了很多地方，呼和浩特、库布齐沙漠、白音锡勒草原、美丽的钢城包头……途中吴泰昌是个老顽童，每到一地，他必呼朋唤友，然后便不知所踪。李下来自《求是》杂志，性情和这家刊物有点相似，莫测高深。由此我和鲁老师夫妇便很自然地结成了一个小组，随意而亲切的聊天渗透在每时每处，仿佛成了一家人。记得在白音锡勒草原，承蒙当地朋友的豪情接待，我误喝了一大碗“草原王”烈酒，头痛难耐，张嘉老师始终陪伴在我身边，还跑了很远的蒙古包，为我讨来热茶醒酒。我沉



本文作者殷慧芬(中)和鲁彦周夫妇在内蒙

浸在二老父母般的慈爱里。慢慢的，我了解到，鲁彦周老师之所以对上海情有独钟还有一个秘密，那就是奠定他文坛地位的《天云山传奇》，剧本就是在上海的永福路上海电影厂文学部的宿舍里改就的。他充满感情地回忆起永福路附近的小面馆、小酒馆，他说那时候年轻，身体好，爱喝点酒，写作兴奋了，睡不着，就会到那些去处小酌几杯。后来我回到上海，办事经过永福路，特别留意那里的街角，我猜想有很多个不眠的夜晚，那里曾经留有鲁老师颀长沉思的身影。

那次旅行结束，我们在北京分手时，都有些依依不舍。鲁老师对我一人去机场不放心，特意关照李下送我到机场。我谢过了，鲁老师说你别谢，你不就像我女儿么，早已父母双归的我，闻言差点哭了。

回上海不久，我便收到了鲁老师的字，那幅字写的是一首五言：“万树寒无色，南枝独有花，香闻流水处，影落野人家。”鲁老师在电话里解释说，他欣赏我的率真和对文学的挚爱。我想，这是鲁老师对我的谬赞了，我唯有自律。

是年深秋，二老从广西南宁旅行回家，绕道上海探亲看病。鲁

老师在上海朋友如云，但是此行是为了张嘉老师延医看病，逗留时间不长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只是让鲁书潮给我打了个电话。家居郊区的我和先生当即驱车去了书潮的家，见面的亲热劲儿自然不必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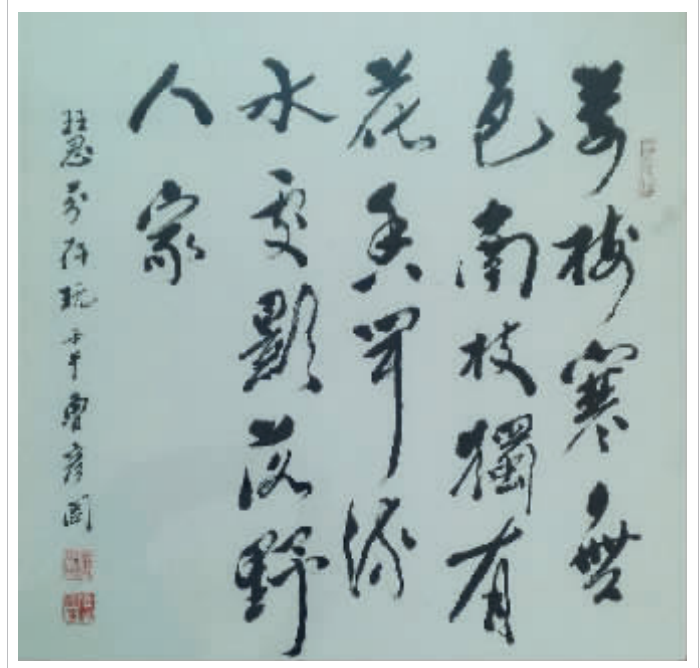
2003 年 4 月，我和鲁彦周老师在安徽宣城敬亭山重聚，那是一次以茶会友的笔会，我还有缘结识了仰慕已久的邵燕祥老师、王火老师、邓友梅老师。他们都是鲁彦周老师的老朋友，看到他们聚在一起，发自内心的天真笑声，我唯有感动和祝福。那次笔会的全部行程，是鲁老师一手策划的。屯溪老街、黄山奇峰、花山迷窟、许国牌坊、歙县渔梁、棠樾牌坊群、名人故里绩溪……每次鲁老师都是步履缓缓地走在其间，还不时惋惜我们错过的风景，比如祁门的牯牛降。

那次赴敬亭山之前，我还顺道拜访了坐落在合肥寿春路的鲁老师宅第。那座两层小楼朴实而显苍老，院子里遍植花草，牡丹、石榴、樱花、桂花、月季、含笑、梅花、映山红……张嘉老师尤其喜欢樱花和石榴，前者灿烂如烟，后者果实累累。书房的斋名“樱榴居”和鲁老师自题的“一树樱桃一树榴，半楼明月半楼书”的对联，

想必也由此而来。

从安徽回来不久，我的眼病突然恶化，无法再继续读书写作。闻知此事，鲁老师和张嘉老师在电话里不断鼓励我、安慰我。后来，张嘉老师的视网膜也出了问题，我极力劝说她到上海来治眼病，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功。每当她在电话里唠叨眼睛不舒服时，我都会感到不安，觉得是自己没尽到责任。鲁老师也时断时续地在医院里治病，其间甚至有过抢救，但我还能在电话里听到鲁老师的笑声，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关心，疾病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近……

鲁彦周老师著作等身。2003 年，我获得了由鲁老师亲笔题赠的八卷本《鲁彦周文集》（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），洋洋四百余万字，有我喜欢的《天云山传奇》《彩虹坪》等名著，我自然爱不释手。鲁老师笔耕不辍，在他病重期间，仍出版有 75 万字的长篇小说《梨花似雪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版），看着他在扉页上题签给我的字，我不由感佩万分。



鲁彦周写给作者的字

（上接第一版）人家问我锺书病情，我只说：“好些了，谢谢”对你却是详细报告了经过。我曾陪住医院二个月，因身体不支，心痛胸闷头晕等等，回家已半年多，也成了摇摇晃晃的人。生老病死原是逃不过的，我已八十四岁，只求别倒在他前面。身边有个女儿很孝顺，女婿要照顾九十老母，只好把他们分拆两处。我觉得一个很好的“生活护理”，在医院伏侍锺书，很尽心，也能干，我和女儿在家做后勤，做种种“鼻饲”的泥，鱼泥鸡泥各种菜泥等，够忙的。

大连请你写文章的该是XXX等人吧？我若有气力，要写信去骂骂他，研究钱锺书，现成有书可读，写什么传，你别去理他。祝你健好。恕我草草，我字都不会写了。

季康五月二十七日

注：杨绛说“其实我该称你‘大姐’”，这是因为王郢（颖婉）是王佩诤先生的大女儿；杨绛信中说的大连的钱锺书研究者，

因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故将其名字隐去。

这封信，我和婆婆看了好几遍，我婆婆是医生，她清楚地知道钱先生病情的凶险。尽管有很好的医疗条件，有孝顺的女儿和深爱他的妻子，她们每天忙着用来鼻饲的“鱼泥鸡泥各种菜泥”，但是，癌症、肾衰，都是医学难题，而老年性肺炎，往往直接危及生命。婆婆怎能不担心呢？

杨绛先生这封信，像她一贯的风格，平淡简洁，不多一字，语气平静。可是，透过字里行间，可以看出她内心的疲惫，她说自己“也成了摇摇晃晃的人”，这“摇摇晃晃”几个字，让我婆婆心痛。可是杨绛说

“生老病死，原是逃不过去的，我已 84 岁，只求别倒在他前面。”一句“别倒在他前面”，尽显妻子对丈夫最深切的爱。杨绛先生曾经在回忆父亲的文章里说起父母亲之间的一次对话，父亲和母亲都抢着说“我死在你头里”，可是，母亲想了想之后，突然说，“还是你先死在我头里吧，否则，我死了，你怎么办呢？”杨绛当时听了，只

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，没想到，如今轮到自己说这样的话了！

我婆婆赶紧去信表达深深的牵挂和慰问。她知道杨绛是个强者，什么困难都压不倒她，可是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人，她担心“摇摇晃晃”的杨绛能否挺过去。我们在心里不住祈祷，希望钱先生的身体会出现奇迹。

谁知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更大的打击随之而来。1996 年，杨绛和钱锺书唯一的女儿钱媛患上肺癌，仅一年便离他们而去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杨绛先生一定痛彻心扉。钱媛生前对友人说，她觉得母亲最可怜，86 岁了，还要照顾两个病人。但是“最可怜”的杨绛挺了过来！

接着，1998 年，钱锺书先生与世长辞。杨绛先生再次挺了过来。她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钱锺书的遗稿包括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，一一整理出来。接着，她把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，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

做完这些，心里踏实，剩下的是她自己的事，她说“即使现在走了，也可放心了！”她像一支将要燃尽的蜡烛，烛光微弱地摇曳。她的坚韧总能让人惊叹，92 岁高龄之际，她写作出版《我们仨》，引起全国文坛轰动。

岁月流逝。杨绛先生写这封信之后 22 年间，她的家散了，剩她一人，坚守 18 年。我婆婆患上阿尔茨海默症，于 2006 年离开我们。婆婆患病期间，储存的记忆被一点点抹去，可有时，久远的记忆常常冒出来，令家人惊喜。婆婆每天翻看书橱里的书，有一天她翻出《管锥编》和《洗澡》，忽然问我：季康呢？我说谁啊？她说季康呀，依不认得了？我一看她手里的书，明白了，我说是杨绛啊！她在北京，忙着呢，每天整理钱锺书的遗稿，还写自己的书呢！

哦，婆婆眼睛一亮，把《洗澡》捧在怀里，笑了。

如今，这几位老友都走了，他们在天堂相聚。我知道，他们从不寂寞。